

牙璋起源刍议

——兼谈陕北玉器之谜

郭静云

(台湾中正大学 历史系,台湾 嘉义 62102)

摘要: 本文认为,鄂西、川东及石家河是牙璋礼器的起源地。陕北神木石峁的玉器是西北族群从江河地区掠夺而来的窖藏珍宝,所以神木玉器的出土,并不代表西北族群制造玉器的高技术水平,而是反映了青铜早期江河平原农耕文明面对来自西北“先戎”掠夺的风险。除了神木遗址之外,西北地区零散发现很多从江河地区夺取的宝贵战利品,包括食物、青铜器、陶器、玉器等。

关键词: 中国史前玉器; 青铜早期时代; 石家河文化; 神木遗址; 牙璋

中图分类号: K 876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672-6219(2014)05-0010-07

一、牙璋的发现地域范围和发源地之谜

中国青铜早期时代玉器中,牙璋是极为精致的礼器,需要非常高的制作技术。因此,牙璋在先民文化中,也应是一种带有强大威力的令牌,乃是权柄之象征。然而牙璋的起源问题,迄今却仍有许多不明之处。从出土数量来说,出土数量最多者为三星堆(近100件),还发现了青铜牙璋和两手举牙璋神人像(图1:11、12),但三星堆文化早期的牙璋只发现7件,且年代皆未早于二里头时期(图1:14-16)^①。而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玉器中,也出土了两件牙璋(图2:3-4)。此外,从青铜器初期以来,牙璋便开始出现在长江流域和江河平原遗址中,如石家河汪家屋场(图2:1-2)、浙川下王岗(图1:1-10)、新郑望京楼等^②。偃师二里头的位也属于江河平原的北界,可归类于同一地域范围。牙璋的起源问题目前尚未能够厘清,但可以肯定的是,虽然成都平原最早的牙璋,其时代并不早于二里头^③,但青铜时代的牙璋礼器,在成都平原已成为重要的文化主题之一。石家河文化汪家屋场和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有些不同,但成都平原不但两种牙璋都有,甚至还有其它形状的牙璋出土^④。

此外,陕北榆林神木县又发现多件牙璋集中出土的遗址^⑤(图2:5-9),引起学者们热烈辩论。由于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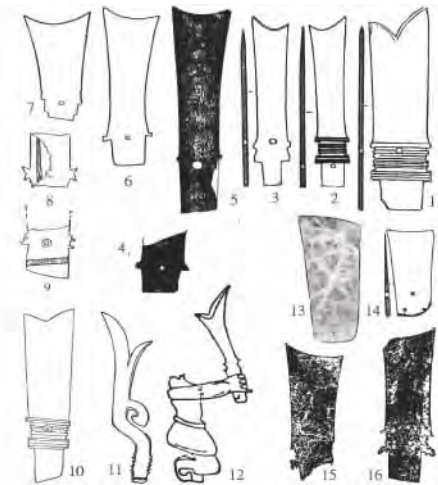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1-3.金沙遗址出土玉制牙璋;4.浙川下王岗文化遗址出土残缺牙璋;5.福建漳浦眉力出土青铜早期牙璋;6.山东海阳司马台出土龙山时期的牙璋;7.武汉黄陂钟分卫湾出土青铜早期牙璋;8.广东乐昌圆岭山出土残缺牙璋;9.广东曲江樟拱桥岭石硠类型遗址出土残缺牙璋;10.广东红花林遗址发掘牙璋;11.三星堆二号坑金属牙璋;12.三星堆二号坑跪人举牙璋铜像;13.松滋桂花村出土石家河文化斜刃微弧璋;14.广汉高骊公社出土二里头时期的牙璋;15-16.广汉中兴乡出土二里头时期的牙璋。

图1 多地出土牙璋材质形制

里头、石峁、石家河等文化都发现了牙璋,冈村秀典先生据此提出神木玉器非本土制造一说,他认为当时中原的统治者即是二里头夏王,玉器则是在礼仪中由夏王分配给南北各地域^⑥。但笔者认为,即使偃师二里

收稿日期:2014-06-19

作者简介:郭静云,女,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,广州中山大学珠江学者讲座教授。

头确实为政权中心,其统治范围也不可能囊括北到内蒙、南到长江这么广阔的范围,况且当时尚存在着许多小型国家,并无统一的政权和社会。此外,偃师周围没有玉矿,因此偃师二里头不可能是牙璋的发祥地,亦或是分配玉器的权威中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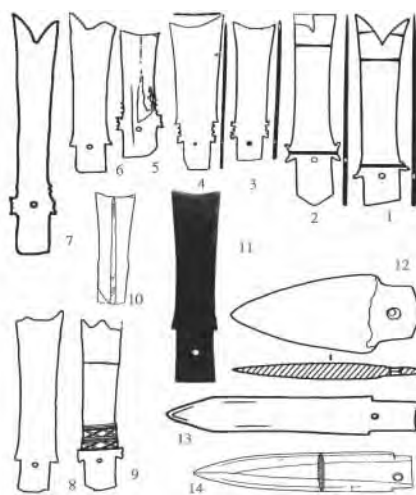
既然神木遗址的牙璋比二里头更早,王永波先生便据此推论牙璋的器型应源自陕北齐家文化^⑦。可是,除了这一批独立石棺出土的28件之外,西周之前的西北遗址都没有发现牙璋,神木遗址墓葬里也没有随葬牙璋。邓淑萍先生认为牙璋是属于华西地区的礼器,但没有指出究竟是西北黄河上中游,还是广汉平原的三星堆^⑧。由于西北和西南地区之间的交通很困难,生活方式及文化内容并不一致,广汉地区是与江汉平原关系密切的古农耕稻作区,而陕北是黄土牧业区,与北方草原来往频繁。因此西北与西南两个差异极大的地区,同时皆被归纳为广泛的“华西”概念之中不甚清楚,而陕北玉器的来源与牙璋的发祥地迄今亦未获得厘清。

二、陕北玉器来源之谜

陕北玉器遗址的情况相当特殊。黄河上游陕北神木发现石峁和新华两座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的遗址,其陶器与河套朱开沟遗址的陶器类型相近。神木遗址的墓葬里都没有陪葬玉器,但石峁却发现了一件保藏美玉的石棺^⑨,新华则发现了专门的藏玉土坑^⑩。戴应新先生曾推论,石峁玉料来自陕西蓝田和甘肃、青海的玉矿^⑪。可是进一步的考察证明,神木玉料的化学成分只是稍微与蓝田、陇青玉料“相似”,但并不“相同”,石峁和新华出土的玉器制造皆非使用周边地区可以开采的玉料^⑫。

神木玉器都存放在专门的石棺或玉坑里,并未见有放在墓葬中当作随葬品的情况,这说明玉器在神木十分稀少,是来自远地的贵重品,而非本地可以自己制作生产的東西。新华玉坑的玉器,大多数属长江常见的玉钺、玉铲等,部分玉铲的玉料和形状与凌家滩玉铲完全相同^⑬,另有长江流域常见的玉戈(图2:13)、玉璜(图4:2-5)、玉圭,以及无疑属石家河类型的玉柄(图3:9)、玉笄及绿松石坠饰^⑭。石峁遗址除了长江流域常见的玉钺、玉铲、玉刀之外,另出土了石家河文化鹰形笄(图3:1、2)、虎头饰(图4:10)、绿松石制的小装饰品,以及28件牙璋(图2:5-9)。

以笔者浅见,神木发现石峁和新华两座遗址的情况,显示其先民将所获得的珍贵物品当作地下宝藏。青铜时期,北方族群南下掠夺,带走宝贵的铜器和玉



1-2. 石家河汪家屋场遗址出土的牙璋;3-4.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;5-9. 陕北神木石峁遗址埋藏的石家河的牙璋;10. 山东临沂大范装出土牙璋;11. 郑州花地嘴遗址出土石家河时期的牙璋;12. 凌家滩玉戈;13. 陕北神木石峁遗址埋藏的玉戈;14. 偃师二里头出土的玉戈。

图2 多地出土玉质器



1-2. 陕北神木石峁遗址埋藏的石家河玉鹰形笄;3. 禹州瓦店玉鹰形笄;4-5. 石家河玉鹰形笄;6. 武汉黄陂盘龙城玉鹰形笄;7. 肖家屋脊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柄;8. 偃师二里头出土的石家河类型玉柄;9. 陕北神木石峁遗址埋藏的石家河类型玉柄;10-11. 二里头下层时期盘龙城李家嘴出土的玉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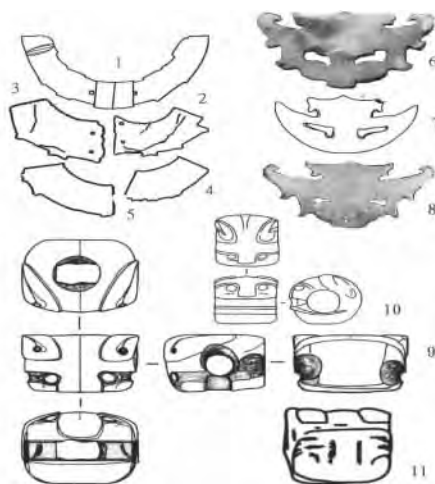
图3 多地出土牙璋制演变

器后,也是存放在地下坑里。神木族群是以掠夺为生的族群,不能过稳定的农耕生活。这也代表在气候冷化、干燥化时期,黄河上游原有的农地变成草原,不利于农耕,反成游牧和掠夺族群的生活区。从青铜初期以来,掠夺族群开始时常顺着黄河经过三门峡而下,掠夺当时江河地区的农耕文明,他们所抢夺而来的玉器、绿松石器都被专门保存在地下当作战利品,神木遗址的美玉棺和玉器坑应亦如此。这些玉器只是战利品,没有被当作祭品或随葬品,也没有进入神木先民的精神生活里。延安芦山峁埋葬玉器年代可能较

晚,但大部分玉器相类似,来源应亦相同¹⁵。

三、青铜早期南北来往和珍贵玉器的流动

在西北地区青铜早期遗址中,经常出土长江流域的物品,包括稻谷、精致的陶器和玉器。例如,汾河流域陶寺遗址发掘出的玉器和绿松石器,明显是从南方获得的宝贵物品。陶寺附近没有玉矿,出土的部分玉器,如钺、环属于常见的器物,难以确知其来源。但从几件形状特殊的玉器,可以发现其源自石家河文明。其中最突显的是玉琮和玉兽面饰。



1. 孙家岗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璜; 2-5. 陕北神木石峁出土的残缺石家河的玉璜; 6-7. 石家河兽面饰; 8. 陶寺遗址出土的石家河兽面饰; 9. 肖家屋脊石家河遗址出土的虎头像; 10. 陕北神木石峁遗址埋藏的石家河虎头像。

图4 多地出土青铜早期玉器

新石器晚期至青铜初期,中国境内有几种玉琮出现。数量最庞大的是东南良渚玉琮文化,但其玉料来源至今学界仍无法确定,因为良渚玉器的数量很多,玉料的来源以南阳、东北以及苏北花玉三种可能性最高。良渚玉琮高矮不一,皆分成双数节,每两节或每一节会刻上良渚文化所崇拜之大神的各种变型图案(图5:4、5)。良渚的玉琮文化随着其文化影响力的扩展,亦沿着长江、淮河、沿海路线传到其它周边地区,因此其它地方的玉琮应是受到良渚礼器的影响。第二种是西北齐家文化的玉琮,玉料应来自本土玉矿,包括甘肃马衔山玉、武山鸳鸯玉、祁连山岫玉、青海玉等。齐家玉琮高矮不一,但都是不分节的磨光壁琮(图5:6)。第三种则是石家河文化用本土汉江流域的玉料制造而成的玉琮。石家河类型的玉琮,可能受到良渚影响,而保留了玉琮分节的形貌,但只是简略地在琮壁上刻几条横线,也没有良渚的崇拜神造型或其它刻纹(图5:1、3)¹⁶。陶寺发掘的两件玉琮皆属于石家河类型(图5:2)。

陶寺玉圭也属于石家河的礼器,长江中游各大溪时期以来的遗址,均可见这类礼器的出土(图6:1)。玉、骨、绿松石的组合发笄可能是本地的制造物,但其零件如半圆穿孔玉片、穿孔玉勾、玉坠、绿松石,都常见于石家河遗址中¹⁷。尤其是绿松石矿就位于石家河文化所在的地区。此外,陶寺还出土了一件兽面饰,即最具代表性的石家河礼器(图4:6-8)。同一时期,附近的芮城清凉寺四期墓中,出土了典型的石家河文化玉虎头¹⁸。这都是西北人从江河平原取得的宝贵礼器。



1. 石家河玉琮; 2. 陶寺玉琮; 3. 石家河残缺的玉琮; 4-5. 良渚玉琮; 6. 齐家玉琮。

图5 青铜早期玉琮

何弩先生详细研究陶寺考古后发现,除了玉器和绿松石是从石家河运输之外,彩陶和精致陶制礼器也源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影响¹⁹。孟原召先生则发现石家河文化的影响到达了晋南地区²⁰。由此可见,黄河中游、汾河流域地区与豫南、汉水、长江流域的文明有一些来往。笔者认为这种来往,可能并非和平的交易,而是北方族群对江河平原族群的掠夺。

当时江河平原乃是以石家河文化为主流的地域,北方族群应该尚未南下至江汉平原,而是从豫中地区夺取稻谷和异地珍宝。显然,陶寺贵族未必非得直接从石家河获得这些宝贵礼器和稻米不可,更有可能是他们从郑偃地区的族群处掠夺或交换而来,由此可见,黄河南侧实为当时南方文化北传的中间站。无论华北先民是从何处具体地获得了这些器物,但其来自南方的事实乃是毋庸置疑的。

历史地理专家注意到,4000年后黄河北侧族群的整体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因为当时气候趋向冷化及干燥化,导致农耕衰退,人们只能改变生活方式或向南移动,开始侵占南方族群的生活区域²¹。与此同时,原本以狩猎为生的族群,则开始改变其“猎取”的对象:从野兽改换为文明社会的资产,并愈来愈

频繁地掠夺丰腴的文明区,从以狩猎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族群,逐步“改行”成为以战争为生的族群。我们从陶寺遗址可以看出,黄河中游的狩猎族群的影响很大,陶寺早期的统治者可能也有这种背景,但是到了毁灭古国之后陶寺上层的冢墓,其墓主应该就是毁灭陶寺古国族群的族长身分,无疑就是掠夺族群的首长,南方玉器恰好发现在他们的墓里²²。

有关中国青铜文明的发祥地,原本学界以为中国的青铜技术皆来自西北。但是近几十年的考古研究,则在湖北地区发现二十余个古城址,尽是高水且丰富的屈家岭、石家河文明之遗迹,并且发现该文明从距今5000年以来,便已开始采集铜矿石,到了距今4500年,更已经掌握青铜合金技术²³。屈家岭、石家河文明范围涵盖江河平原,北传到黄河南侧。因此对华北这些流动的族群来说,丰饶的江河平原,无疑是他们最佳的掠夺目标。黄河北侧的族团经常南下掠夺,大肆搜刮稻谷和美玉。例如,汾河下游的芮城清凉寺遗址,在大约距今4200至3900年间,发现了近似陶寺和齐家文化的文物,但此遗址却没有农耕生产的迹象。清凉寺遗址墓葬中带有随葬品的地层,其时代也与陶寺大致相同。随葬的玉器有两种,部分是典型的齐家文化玉器,另一部分则是南方的类型,其中还有石家河文化的玉制虎头等²⁴。这是掠夺族群的典型遗址。

四、青铜早期几种典型玉器的发祥地问题

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石器、玉器,也可以显示出其族群与长江中游、汉江流域、广汉平原的关系。二里头遗址中的玉器不多,都出土自后期的墓葬里,其中有玉戈、璧戚,还有玉柄、玉圭、玉铲、牙璋、多孔刀²⁵。二里头的玉柄、玉铲、牙璋,都早已见于石家河遗址中²⁶,而殷墟也出土了数件完全同样的玉柄²⁷,显示石家河文化玉器在殷墟时期依然持续被使用。大溪文化、石家河文化也出土了小玉圭,此外日照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圭,很多学者也认为其来源与石家河文化有关²⁸。玉圭和牙璋多见于广汉成都平原地区的三星堆文化遗址中,成为三星堆代表性物品²⁹。西北族群南下江河地区进行掠夺,未必直接能到达汉江流域这么远的地方,但偃师二里头遗址位于江汉平原北界,也是黄河南侧的遗址,在某程度上,能作为南方文化北传的中继站。无论黄河北侧族群具体上是从哪里得到这些藏在神木遗址中的美玉,至少我们可知其中大部分的玉器,与汉江流域的玉器是相同的。

如从玉柄形器和玉鹰形斧来说,同样的玉斧最早

是在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发现过,黄陂盘龙城、河南禹州瓦店遗址也都出土了这种玉斧(图3:3-6),皆属石家河文化的遗物。玉柄形器无疑也是源自石家河文化的玉器,原本石家河文化和盘龙城文化的玉柄形器都有一个特点:下面用圆块绿松石作镶嵌,这属于最典型的汉水流域贵族用的玉柄形制(图3:7-11)。阶级稍微低一点的人物,其随葬的玉柄便已没有绿松石镶嵌。类似这种源自石家河文化的玉柄形器,在当时成了颇为流行的玉器,因此现今我们仍可在二里岗、殷墟遗址中见到这类玉器出土(图3:7-11)。石家河文化玉器类型既被保留在本土青铜文化中(以盘龙城为例),同时又往北、西、东方向传播,且在西方被长期使用,成为三星堆文化的标志物。商都殷墟也有很多从石家河文化传入的玉器,最有名的例子是石家河文化的凤与殷墟妇好墓出土凤的比较,其形制设计皆为一致。其它殷墟最精致的玉器的玉刻技术和艺术,也都源自石家河文化,两周玉刻亦承袭之,如河南信阳光山县的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所出土的人头像等玉器³⁰。同类的例子不胜枚举,在学界也早已有许多相关论述。黄君孟夫妇墓的位置属于原来石家河文化的范围,可见在春秋时期,本地也传承了青铜器时代之前的精神文化与玉刻艺术风格。

神木出土的玉戈在新石器玉器中相当少见,到了青铜时代最大的几件玉戈在盘龙城遗址中出土,此外有两件出现在二里头,而目前所见最早的,是较短的玉戈,出土于江淮含山凌家滩墓中(图2:12-14)³¹。稍晚,这种玉戈便大量出现在盘龙城和三星堆遗址中。虽然二里头的两件玉戈时代皆比三星堆早,但目前却仅发现两件,且在二里岗时期也见不到。假设凌家滩玉戈可以视为最早而被其它地区传承的器型,则玉戈便有可能也是源自长江中游的礼器,只是目前尚未在更早的地层中发现³²。不过,因为早期玉戈发现不多,所以我们亦不能排除玉戈其实是源于秦陇齐家文化的可能性。如果想要确切得到这方面的答案,那么便只有在专家真正确定铜戈形状来源,及其与玉戈的关系之后,才能有讨论根据。

至于神木遗址大量出现的多孔长刀器型(图6:4、5),虽然分别可见于不同的地区(甚至东北红山)³³,但这也是源自新石器晚期、金石并用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北岸文化。这种形状的多孔长刀以及石铲、玉铲,大量出土在距今6000~5000年前的江苏北阴阳营(图6:3)、安徽潜山县薛家岗文化二、三期遗址中³⁴(图6:6-8)。而这些礼器也循着长江传到江西、湖北地区,如湖北黄石屈家岭文化遗址中的出土遗存(图6:2)³⁵。而在偃师二里头也发现过一件(图6:9)。河南

境内的淮河流域曾发现有薛家岗文化的遗物。从苏皖平原到中原的交通线,除了绕行湖北之外,还有另一条经过黄淮平原的路线。淮河、汉水流域两条水路,从新石器以来,即为江河平原主要的交流、传播线。不过淮河线在中游与上游间的联系并不强;而汉水流域的宽阔平原形成更密切的关连。多孔长刀当时早已传入长江流域,或许也是经过汉水到达黄河南游,并经由北方族群的掠夺行为,而传入黄河上游河套地区。



1. 大溪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圭; 2. 湖北黄石屈家岭文化遗址三孔石刀; 3. 南京北阴阳营遗址玉刀; 4-5. 陕北石峁遗址埋藏玉刀; 6-8. 薛家岗文化玉刀; 9. 偃师二里头遗址玉刀

图6 青铜早期玉质刀、圭

从新石器中晚期以来,长江各聚落开始有职司专业化倾向,北阴阳营、薛家岗、大溪都发现了几座石工坊和玉工坊^⑧。除了本土特殊的礼器之外,大量生产广泛通用的石器和玉器:如钺、斧、铲、刀、环、璜等。是故,这些形状皆属南方器物。神木出土的玉璜,与石家河和凌家滩都一致(图4:1-5),更不用说虎头像是石家河的玉器独特造型(图4:6-10)。

虽然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,长江中上游形成的玉器文化比中下游可能稍晚,但是少数玉器的发现却相当早。大溪、屈家岭文化地层中发现的玉器形状不甚多,大部分是小型的玉块、璜、柱等,如荆门龙王山大溪晚期的墓中发现的几件玉璜,其形状皆属于典型的崧泽玉璜^⑨;三峡地区的数种璜、块、小型动物,都从大溪时代以来被普遍发现^⑩。可见当时的长江中、下游地区,大量制造了一些具有共同形状的玉器。虽然我们习惯将这些器型视为崧泽文化的创作,但既然崧泽本土没有玉料,而大溪却有,所以这些玉器真正的来源地,还需要学界做更进一步的研究。我们不妨假设,屈家岭人或许利用长江下游族群对玉的欣赏,而将鄂西、豫西南山地玉料和玉器作为外销物资东传。

至于石家河阶段,长江流域通用的钺、铲、镞、斧、

刀等大型的玉制令牌,已常见于石家河文化墓葬中。其中部分器型与崧泽、良渚相同,但石家河文化带边齿的玉璜(图4:1-5),与凌家滩的大致相同。远从大溪时代已有这些形状,但是在凌家滩时代,才成为常见的代表性遗存。因此长江中、下游玉器的关系比较复杂,互相影响的特征也较为明显。大溪时期的长江中游居民已能使用陶制耳栓,但后来却开始制造玉栓,应该也是受到凌家滩的影响。通过凌家滩,石家河文化亦吸收了原属于东北族群的玦龙形状。石家河玉坠形状与良渚玉坠相似,但刻纹却不同,江汉先民有自己的信仰脉络,不会在自己的礼器上刻出良渚或其它文化的崇拜对象;同理,石家河的琮璧也不会刻上良渚神像。

换言之,长江中游地区早期遗址发现的玉器,某种程度上可能与良渚及凌家滩玉器文化的影响有关,在此基础上,形成了石家河玉器的独特面貌。据荆州博物馆的化学检验,石家河玉器使用的是南阳的玉料,因此我们可知,石家河文明有本土的南阳独山玉料。这让石家河成为制造玉器的中心,玉器则成了石家河对外交易的重要物品之一。

五、牙璋来源刍议

因为玉料的分析已经确认,神木玉器的原产地并非本土,或许源自许多不同的地方,所以很难推测明确的来源。从制造牙璋技术以及牙璋形状来看,与其最近的器物是长刀,而制造长刀的原产地,乃是苏皖平原的北阴阳营、潜山薛家岗文化,并由此传到良渚文化区。青铜早期的文化传播,又使得长刀成为山东龙山的礼器^⑪。不过,如今我们在一些龙山出土的长刀上,还可以看到与石家河文化有关的神面图^⑫,这可能是因为安徽与山东之间的水道路线十分通畅,并可通到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地区,所以从长江中上游到山东文化之间的交往相当普遍,石器、陶器的同化趋势也相当明显。虽然潜山遗址中并没有发现牙璋,但学界基本上的共识,皆认为牙璋与长刀的器型有关^⑬,或许就是周围的文化受到薛家岗长刀的启发,进而创造出牙璋的形状。又因当时长江交通便利之故,这种“周围”未必一定距离皖南很近,甚至可能远及山东或广汉地区。

从牙璋的形制来看,屈家岭、石家河遗址常见的斜刃微弧璋,就很像牙璋的雏形,这种形状的斜刃石璋,最早出现在大溪晚期松滋桂花树遗址中(图1:13)。广汉地区的石家河至二里头的地层,也曾发现同类的璋形器(图1:14)。鄂西与广汉之间藉由长江

来往,在大溪时期已相当密切。青铜时期牙璋在广汉地区的兴盛,可能就是因为其形成于离南阳玉矿很近的鄂西地区。

与石家河牙璋同时期的山东临沂大范庄、海阳司马台,都是属于龙山类型的遗址。大范庄的牙璋与石家河的斜刃璋同样没有阑下柄部(图2:10),而司马台与石家河汪家屋场牙璋的形状、比例、阑柄的造型都很相似(图1:6;二:1、2)。应该是时代相同、产地相近的牙璋。河南浙川下王岗出土的牙璋残缺柄部(图1:4),也与汪家屋场的相同。从广汉到鲁东南,牙璋的形状基本上都相同,这或许可以代表其向东、西传播的路线,及其在长江中游的制造中心。在这一路线中,或许还包括有在黄陂盘龙城、钟分卫湾的青铜早期地层(图1:7),因为此地也出土了几件牙璋。而湖南石门桅岗牙璋的年代也不晚于盘龙城二期,可能属于更早的石家河时代遗物。

从新石器、青铜器一直到商周时代,牙璋零散在广东、福建、香港,甚至越南等各地遗址中被发现。广东曲江樟拱桥岭遗址出土的残缺牙璋(图1:9)属于石峡文化类型(距今3700~5000年间),与石家河年代相近。石峡文化遗址发现很多良渚陶、玉,显然当时从江浙到广东之间有沿海交通。在这条路线上,广东乐昌圆岭山发现了残缺的牙璋,时代为石峡晚期。广东红花林遗址发现疑为青铜时期的牙璋(图1:10);属于良渚马桥文化传播区的福建漳浦眉力,也出土了青铜早期牙璋(图1:5)^②。透过这些发掘,可推论长江中游的文物或许也经由江浙沿海传到粤闽。此外还有两件殷商时期的牙璋在香港出土^③。在越南则出土了四件牙璋,其中两件似为石家河时代的牙璋,出土遗址的年代为距今3400~3800年间;另外两件则是典型的三星堆牙璋^④。或许是从四川经过云南或贵州而来,这与三星堆可能采用云南的金属料有关。

考古发掘之外,国内外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也收藏了不少牙璋,因不知其来源,故本文不予讨论。但其中确有几件十分引人注目,如有双头鸟的刻纹的牙璋之流。双头鸟常见于长江中下游的礼器上,最早可溯至钱塘江的河姆渡文化,但这种图形却也出现在贵州苗族的传统刺绣上^⑤,皆属江南文化的脉络。可惜这件文物来源不明,所以证据力不足。

目前零散出土的牙璋都出现在华南地区,与长江流域有地理上的关联。长江流域、华南之外,牙璋则多见于豫中二里头、二里岗遗址中。偃师二里头与新郑望京楼共发现五件二里头三、四期的牙璋(图2:3、4)。郑州和许昌发现两件二里岗时期的牙璋^⑥。中原地区与石家河汉水流域是一个大平原,本文已从各方

面阐述过汉水文化北传的状况。因此豫中出土的牙璋最可能便是源自石家河。

六、结语

综上所述,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:第一,出土在江汉及成都地区的屈家岭、石家河斜刃璋形状,有可能是牙璋的雏形;第二,最流行的牙璋文化是广汉地区的青铜文明,与鄂西石家河有传承关系;第三,新石器晚期的牙璋以屈家岭、石家河文化为基础,长江流域和中原则是牙璋出土数量第二多的地区;第四,出土牙璋地区之间的关系,以江汉为中心环节。

依此,我们可以推断,鄂西、川东及石家河是牙璋礼器的起源地。陕北神木石峁的玉器是西北族群在江河地区掠夺而来的窖藏珍宝。所以神木玉器的出土,并不代表西北族群制造玉器的高技术水平,而是反映了青铜早期江河平原农耕文明面对来自西北“先戎”掠夺的风险。除了神木遗址之外,西北地区零散发现很多从江河地区夺取的宝贵战利品,包括食物、青铜器、陶器、玉器等^⑦。

石家河有本土出产的玉料,虽然江汉地区制造玉器业发展比长江下游稍晚,但直至石家河时代,便已有了几处庞大的玉石作坊,且技术极高,玉石加工颇为精致,超越长江流域其它地区著名的玉器文化^⑧。石家河晚期的肖家屋脊、煤山、罗家柏岭等庞大玉坊的年代,都早于二里头的玉器^⑨。因此笔者认为,石峁遗址的牙璋与其它陕北玉藏,都是从外地掠夺而来的宝贵物品,且皆掠夺自南方。

注 释:

- ① 邓淑萍《也谈华西系统的玉器(二)》,《故宫文物月刊》1993年第6期,第66、68页。
- ② 王永波《耜形端刃器的分类与分期》,《考古学报》1996年第1期,第1-61页。
- ③ 邓淑萍《也谈华西系统的玉器(二)》,《故宫文物月刊》1993年第6期,第62-71页。
- ④ 李忠义主编《三星堆传奇》,台北:太平洋文化基金会,1999年,第133-147页;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朱章义、王方、张擎《成都金沙遗址I区“梅苑”地点发掘一期简报》,《文物》2004年第4期,第33、34、37页,图八四、八五、八七、八八、八九、一〇二;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、光山县文管会、欧澧生《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》,《考古》1984年第4期;图板伍:林继来《论春秋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玉器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2001年第6期,第71-74+57页。
- ⑤ 冈村秀典《公元前两千年前后中国玉器之扩张》,邓聪编《东亚玉器》,香港:香港中文大学,1998年,第79-85页,图9.1;王炜林、孙周勇,《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2011年第4期,第40-49页,图一。
- ⑥ 冈村秀典《公元前两千年前后中国玉器之扩张》,第79-85页。
- ⑦ 王永波《耜形端刃器的分类与分期》,《考古学报》1996年第1期。
- ⑧ 邓淑萍《也谈华西系统的玉器(二)》,《故宫文物月刊》1993年第6期,第60-71页。
- ⑨ 戴应新《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察》,《故宫文物月刊》1993年第

- 5期;邓淑萍《也谈华西系统的玉器》,《故宫文物月刊》1993年第6期;王炜林、孙周勇《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》第40-49页。
- ⑩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、邢福来、李明、孙周勇《陕西神木新华遗址1999年发掘简报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2002年第1期,第3-12+97页。
 - ⑪ 戴应新《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(一)》,《故宫文物月刊》1993年第5期,第46-55页。
 - ⑫ 孙周勇《神木新华遗址出土玉器的几个问题》,《中原文物》2002年第5期,第37-42页。
 - ⑬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、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《神木新华》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5年,彩版十至二四;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《凌家滩玉器》北京文物出版社,2000年,第19-28页,图10-22。
 - ⑭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、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《神木新华》,彩版二五、二八。
 - ⑮ 姬乃军《延安市芦山峁出土玉器有关问题探讨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1995年第1期,第23-29页。
 - ⑯ 荆州博物馆《石家河文化玉器》,北京文物出版社,2008年第165-166页,图138、139。
 - ⑰ 高炜《陶寺玉器及相关问题》,邓聪编《东亚玉器》,第192-200页,彩版55-62。
 - ⑱ 荆州博物馆编著《石家河文化玉器》,第50-95页,图78-63;李建忠《龙现中国:陶寺考古与华夏文明之根》,山西人民出版社,2006年,第99、92页。
 - ⑲ 何弩《陶寺文化谱系研究总论》,解希恭主编《襄汾陶寺遗址研究》,北京科学出版社,2007年第408-435页。
 - ⑳ 孟原《召屈家岭文化的北溯》,《华夏考古》2011年第3期,第51-63页。
 - ㉑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、鄂尔多斯博物馆编《朱开沟: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》,北京文物出版社,2000年;韩茂莉《论中国北方畜牧业产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》,《地理研究》2003年第1期,第89-95页;韩茂莉《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》,《考古》2005年第10期,第57-67+2页。
 - ㉒ 参侯毅《从陶寺城址的考古新发现看我国古代文明的形成》,《中原文物》2004年第5期,第13-19页;高天麟《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农业发展状况初探》,《农业考古》1993年第3期,第64-71页;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、临汾市文物局、严志斌、何弩《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》,《考古》2005年第3期,第307-346+381-387+390页。
 - ㉓ 屈家岭、石家河研究只有最近十年几纔开始,但已有的成果推翻了原来对青铜文化来源的看法。如参邓家湾、肖家屋脊、煤山、罗家柏岭、盘龙城、大冶等遗址的发掘报告和相关的学术文章。
 - ㉔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、云城市文物局、芮城县博物馆、薛新明《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》,《考古学报》2011年第4期,第3-6+97页;陈靛、薛新明《山西芮城清凉寺新石器时代墓地人口构成研究》,《西北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10年第6期,第37-40页;山西省考古研究所、云城市文物局、芮城县博物馆、薛新明《山西芮城清凉寺新石器时代墓地》,《文物》2006年第3期,第4-16页。
 - ㉕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《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、八区发掘简报》,《考古》1975年第5期,第302-309+294+328-329页;偃师县文物局《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》,《考古》1978年第4期,页27;杨国忠、刘忠伏《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》,《考古》1983年第3期,第199-205+219页;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《偃师二里头:1959年~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》,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1999年,第249-251页,图161-163;第168页,图257;第342页,图238;图板118、119、112、125;许宏《二里头遗址文化分期再检讨——以出土铜、玉礼器的墓葬为中心》,《南方文物》2010年第3期,第44-52页。
 - ㉖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考古队、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著《肖家屋脊——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》,北京文物出版社,1999年第331页,图二六一;荆州博物馆编著《石家河文化玉器》,第110-122、167、168页,图74-86、140、141;戴应新《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(二)》,《故宫文物月刊》,1993年第6期,第46-61页。顾问、张松林《二里头遗址所出玉器“扉牙”内涵研究——并新论圭、璋之别问题》,《殷都学刊》2003年第3期,第22-32页。
 - 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《安阳殷墟出土玉器》,北京科学出版社,2005年第21-31页。
 - ㉘ 荆州博物馆编著《石家河文化玉器》,页19;王劲《石家河文化玉器与江汉文明》,何介钧主编《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,长沙岳麓书社,1996年;邓淑萍《也谈华西系统的玉器(六)——饰有弦纹的玉器》,《故宫文物月刊》,1994年第10期,第82-91页;(日)林巴奈夫著、杨美莉译《中国古玉研究》,台北艺术图书公司,1997年,第232-243页。
 - ㉙ 高大伦《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的初步考察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1994年第2期,第82-86页;敖天照《三星堆玉器再研究》,《四川文物》2003年第2期,第39-45页。
 - ㉚ 荆州博物馆编著《石家河文化玉器》,第6-8、16-18、35、42、97-100页,图8、15、65-67。
 - ㉛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《凌家滩——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》,北京文物出版社,2006年,彩版二〇八:3、4。
 - ㉜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《盘龙城:1963-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》,北京文物出版社,2001年,彩图一九、二七、四一、四二、图版五三、六一、六五:5、九八等;高大伦《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的初步考察》,第83页,图一;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朱章义、王方、张擎《成都金沙遗址1区“梅苑”地点发掘一期简报》,《文物》2004年第4期,第26、27、29、30页,图六四、六五、六八至七二。
 - ㉝ 柳冬青《红山文化》,沈阳内蒙古大学出版社,2002年第99页。
 - ㉞ 杨德标《潜山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》,《考古学报》1982年第3期;杨美莉《多孔石、玉刀的研究》,《故宫学术季刊》,1997年第3期,第17-74+2-3页。
 - ㉟ 黄石市考古所发掘,展出于黄石市博物馆。
 - ㊱ 张弛《大溪、北阴阳营和薛家岗的石、玉器工业》,《考古学研究(四)》,北京科学出版社,2000年第55-76页。
 - ㊲ 荆门博物馆发掘资料。
 - ㊳ 四川省博物馆、范桂杰、胡昌钰《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》,《考古》1981年第4期,第461-490+551-558页;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、四川大学历史系、马继贤、卢尔德佩《宜昌线清水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》;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湖北工作站编《三峡考古之发现》,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,1998年,第184-201页;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、四川大学历史系、陈任贤、谢达远《宜昌中堡岛新石器时代遗址》,《考古学报》1987年第1期,第45-97+132-139页;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、王晓田《湖北宜昌县下岸遗址发掘简报》;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湖北工作站编《三峡考古之发现(二)》,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0年,第439-448页,图5;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杨权喜《长江三峡工程坝区白狮湾遗址发掘简报》,《江汉考古》1999年第1期,图13;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《武昌放鹰台》,北京文物出版社,2003年,第64页,图四二,图版三一;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《京山屈家岭》,北京科学出版社,1965年,第20-21、37-38、67-69页,图十五、二七、五四;王善才主编、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《清江考古掠影及出土文物图录》,北京科学出版社,2004年,第70、75页。
 - ㊴ 杨美莉《多孔石、玉刀的研究》。
 - ㊵ 邓淑萍《也谈华西系统的玉器(三)——玉刀》,《故宫文物月刊》1993年第7期,第86-93页。
 - ㊶ 林巴奈夫(日)著、杨美莉译,《中国古玉研究》,第286-349页。
 - ㊷ 宋建《马桥文化的分区和类型》,《东南文化》1999年第6期,第6-14页;焦天龙《论马桥文化的起源》,《南方文物》2010年第1期,第70-75+58+59页。
 - ㊸ 彭适凡《礼器“牙璋”的类型学研究——兼论香港大湾新出牙璋的年代》,《故宫学术季刊》1996年第3期,第105-123页。
 - ㊹ 王永波《耜形端刃器的分类与分期》,第9、26、37页。
 - ㊺ 宋兆麟《河姆渡骨匕对鸟图案试析》,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,1997年第1期,第25-31页。
 - ㊻ 王永波《耜形端刃器的分类与分期》,第4-5、25、28、33、38页。
 - ㊼ 李水城《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》,《考古学报》2005年第3期,第239-275+278页,图一七:5。
 - ㊽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张云鹏、王劲《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》;郭立新《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(4300B.C.-2000B.C.)》,第100-108页;荆州博物馆编著《石家河文化玉器》。
 - ㊾ 荆州博物馆编著《石家河文化玉器》,第1-18页。

[责任编辑:刘自兵]